

德国歌唱家格哈赫尔为何去复旦讲课?

◆ 姜林静



演出曲目到最后的安可,都出自对艺术本身的考量。上半场的《克尔纳歌曲集》是舒曼套曲中较晚被予以关注的杰作。格哈赫尔与胡贝尔的演绎完美展现了诗与乐的水乳交融。无论多么冷门的套曲,他们都坚持呈现整体。通过一首首的情绪转换、色彩变化,构建出叙事、抒情与哲思并行的立体作品。如泣如诉

的舒曼没有被涂抹上蜂蜜,而是结束在阴冷与无望的坟墓中。倒数第二曲《是谁让你变得那么病恹恹?》,格哈赫尔细若游丝的歌声仿佛临终的哀叹:“那些致命伤痕,皆由人类所致,自然本可治愈我,人却不让我安宁。”曲终时,早已泪流满面。次日早晨,上海迎来久违的明媚阳光。我如约和格哈赫尔碰面,

趁复旦的活动开始前带他在城里逛逛。我们去外滩源附近看建筑,他惊叹于“新”与“旧”在上海的结合。可事实上,我收获的感叹才更多:作为一名歌唱艺术家,格哈赫尔的文学素养超过了很多我所认识的文学研究者。一路上我们讨论着《冬之旅》终曲中最后两句问句的含义,究竟是死亡还是和解。他解其为反讽,细节的解读令人动容。“冬日的旅人看见摇琴的老翁,发现自己与日复一日的庸常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就是旅人唱出的那些歌。即使孤独即使苦楚,但只要还在歌唱,就不可能走进死亡。”我切切实实地知道,这位艺术家的伟大绝不仅仅在于天赋和技巧,更是对存在真切深沉的思考。

当晚,格哈赫尔与胡贝尔为复旦学子献上了一场特殊的“大师班”。两人以舒曼《诗人之恋》的第一曲《在那娇美的五月》开场。在我眼中,它象征着犹如童话故事般的开端:两位热爱艺术的青年从这首曲子结缘,神奇地合作至今已超过三十六载。“花蕾绽放”“鸟儿歌唱”,

这岂不是对复旦学子最好的鼓舞吗?如果大学里只剩下对未来的预判和焦虑,何有时间和空间让“爱射出光芒”?如果只依靠技术绩效来评判成功与否,又怎能对“真善美”怀有“思念与渴望”?

在那个音响效果并不理想的礼堂里,两人一会儿深度解析,一会儿深情演绎。他们是如此真实,毫不回避沉重的话题,例如死亡。他们是如此释然,总是带着一种黑色幽默,用艺术的力量去消解原本不可承受之痛。两个小时里,他们演绎了从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到勃拉姆斯、沃尔夫和马勒共七首歌曲,带领大家体味了德奥艺术歌曲中的玩笑、忧郁、恐怖、荒诞、深思和反讽,像是进行了一次穿梭百余年的时空之旅。

撇开所有细节,回到对谈开始时我抛给两位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为表演艺术家,你们却这么热衷于讲台?”格哈赫尔答:“能靠音乐谋生的人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通过表演和教学,让古典艺术存活下去。”

这堂生命课虽“结课” 人生的课堂还将继续

——写在《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暂别之后

◆ 陈超

上周末,由金士杰、卜学亮主演的话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回到中国大陆地区首演地上海人民大舞台,完成了其巡演14年后的收官场。该剧作品根据美国著名作家米奇·阿尔博姆的畅销书《相约星期二》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位得了渐冻症的老教授莫利,与他的学生米奇在每个星期二早晨围绕“生命、死亡、爱、工作、家庭、衰老……”等人生活话题,展开的临终前最后的14次对话。

把时间往前推一个月的夜晚,我收到了《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制作人邬希芸发来的消息,告知这部我曾在大学时期参与演出的舞台作品即将“封箱”,问我是否愿意回剧组一聚。

原来距“星期二的课”大陆首演已过去了14年。作为一部翻译剧在不换主演的前提下连演300余场,这在当下的演出市场,可谓“票房奇迹”。带着对剧组的情感与对这份奇迹的好奇,我再次回到了这个自己曾服务过两年多的剧组。

看过《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的观众都知道,下半场的演出基调会变得更加感性,观众席间的啜泣声也会变多。但对主演金士杰而言,饰演莫利一角让他感受到与“生命打仗的蓬勃斗志”。他在“星期二的课”演出第300场时写道:“这是一段两个人的故事。一开始觉得这出戏是个单纯的小品,用小小题小做的方式切入,没想到演出后会一场接一场,像是小兵立大功,有种喜出望外的感觉。”

然而,即使已演出了300余场,这次我在人民大舞台的后台依



然看到金士杰与卜学亮在聊这出戏给自己的新感悟,一同探讨在最后这轮演出中,在节奏上、情绪上还有哪些可以微调的空间。所以,熟悉的“星期二的课”依然在进化。两位老师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传递对舞台的敬畏、对观众的尊重。同样,制作团队也没有辜负他俩安静地与这部早已成为他们生命一部分的戏剧好好道别。因此没有安排诸如“星光大合影”这样的观众互动环节,就是希望保持剧目一以贯之的完整性,“我们一直记着莫利说的‘该说再见的时候就说再见……’”邬希芸说道。

14年过去了,不仅是台下正襟危坐的观众,连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潜移默化地成为莫利教授的“学生”。于我而言,14年后再看此剧,正是应了弘一法师那句“初看不知

戏中意,再看已是戏中人”。

剧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担任报社体育专栏记者的米奇告诉莫利教授,其实有时候,他也会看见自己死亡。米奇说:“我在自己的书桌上奋笔疾书,写着我的专栏,然后咚的一声,倒了下去。然后我的编辑把那篇文章从我身下抽走,交给别人,然后那个人再奋笔疾书,把稿子写完。”

“你和你的心灵能够和平相处吗?”

“别把自己的光芒藏在量米的斗里。”

“你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死去,就能知道要怎么样活了。”

“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这次重回“星期二的课”剧组的经历,让我有机会站在侧幕再次聆听莫利教授的“人生智慧”,感受到这样一份珍贵的“时间礼物”——我也像剧中的学生米奇那样,从不会爱、不敢爱到接受爱。同时,也让我更加认识到戏剧本质上是一门凝聚群体力量的艺术形式,正如“星期二的课”这个有爱的剧组。它搭建起一个独特的桥梁,促成人们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相聚、交流与碰撞,悄然传递着某个特定群体所共有的生命体验、情感波澜与价值思索。这种群体性的情感纽带与精神传递,赋予戏剧别样的厚重感与感染力。

虽然这堂生命课已“结课”,但人生的课堂将继续。我相信即使不在剧场相见,只要未来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们突然能想起戏中的某个“金句”,这何尝不是一种历久弥新的“相遇”?



逻辑重音把握得当,增强了戏剧张力。与译制片中毕克为波洛赋予沉稳中更有威严的台词风格不同,吕凉能根据观众反应调整表演力度,用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呈现出更具亲和力和调皮色彩的声音形象。周笑莉饰演的奥特伯恩太太太神地将她神经夸张的形象呈现,徐幸饰演的斯科勒小姐在戏里为数不多的出场里,依然将其优雅、傲慢又贪婪的老贵族形象演绎得令人记忆深刻。

该剧舞台设计遵循了现实主义风格,还原了那个年代的风格。舞台精心设计了一个能让观众“一键穿书”的场景:18道景片、14.5米的吊桥将原著和电影中出现的豪华的瀑布酒店、雄伟的神庙石柱、旖旎的尼罗河沿岸风光、精致的游轮内外部分都错落有致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台上,游轮投射了波光粼粼的水影,配上水流声,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一艘行驶的尼罗河上的巨轮正在成为一个巧妙的密闭空间,让台上的每一个人都参与参与到剧中无处可逃。

一部好的推理戏剧会在处理原著和舞台视听呈现上都下足功夫,呈现出上海戏剧高质量、时尚化、有格调的艺术特质。正是由于满足和尊重观众的推理剧情怀,上海已经培养出一批固定受众群体,为推理戏剧的再现树立了标杆。

从中文版舞台剧《尼罗河上的惨案》谈起 推理剧为何唯独在上海长盛不衰

◆ 程姝姝

中文版舞台剧《尼罗河上的惨案》日前开启了在上海艺海剧院的第二轮演出。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在1979年《译林》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后就引起读者追捧。上海译制片厂还在同年引进了英国影片,精彩传神的配音为绝妙的逻辑推理增加了戏剧效果,铸就译制经典,成为一代人的美好记忆。“阿婆”也成了中国观众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昵称,以此表达对其作品的情怀。

该剧是首次以话剧形式登上中国舞台,汇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中青三代演员。导演林奕将全剧18个主要角色进行精心的安排和调度,有层次、有个性、有对比地呈现在舞台上,充分尊重阿加莎原著小说里“人人都可能是凶手”的理念。吕凉塑造的比利

大侦探波洛,在形象与语言上都完美地将这一人们心中的经典形象具象化在舞台上。波洛的台词往往充满逻辑和哲理,吕凉在台词处理上,语气沉稳又十分幽默,尤其是在推理环节,他的台词节奏和